

· 新中国大使丛书 ·



不寻常的谈判

王殊 肖向前等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书 名 不寻常的谈判
编 著 者 王殊、肖向前等
责任编辑 吕 佳 汪意云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375 插页 4
印 数 1901—6940 册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299—5/D·225
定 价 18.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为《江苏人民出版社新中国大供丛书》

持节使异域
结谊遍全球

耿飚

九三年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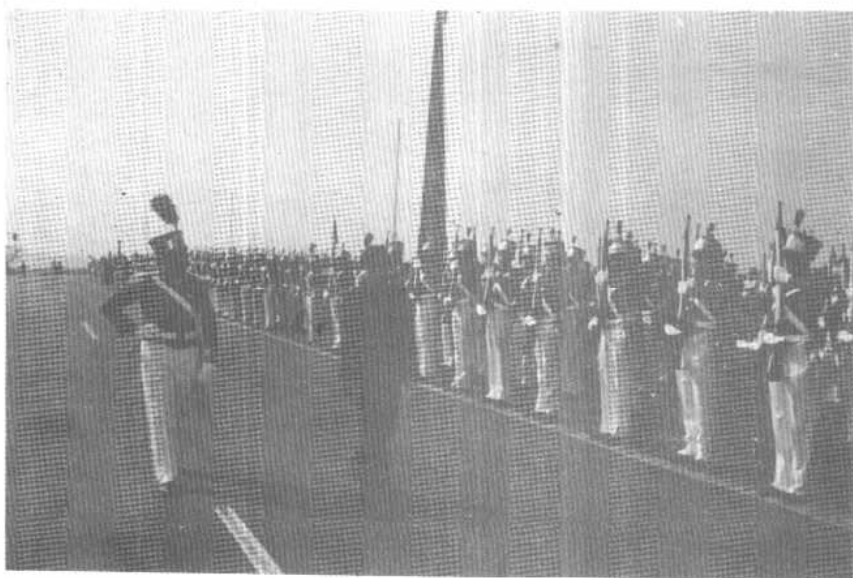
1976年11月22日王殊大使向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辞行拜会。



1972年7月20日在藤山爱一郎举行的欢迎招待会上，孙平化、肖向前与日本政界首脑相聚。



60年代杨公素大使出席巴基斯坦驻尼泊尔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并与尼泊尔军政要员亲切交谈。



陶大钊大使赴巴西任职，递交国书后，在总统府门前检阅巴西龙骑兵仪仗队。

目 录

从记者到大使	王 殊(1)
为中日世代友好努力奋斗	肖向前(151)
三任大使的不同经历	杨公素(336)
中美建交序幕从华沙揭开	骆亦秉(365)
面对周总理的一次“考试”	赵 源(373)
战乱中的外交生涯	金伯雄(380)
使我难忘的塞内加尔老朋友	谢振骝(394)
墨西哥工作轶事	李善一(400)
赴巴西上任前后杂忆	陶大钊(414)

从记者到大使

王 殊

一、中德建交前前后后

呈递国书

我国政府任命我为驻联邦德国大使以后,于1974年9月17日在波恩向谢尔总统呈递了国书。当时,总统府正在全面整修,谢尔总统在旁边的一座小楼房里办公。因此,呈递国书的仪式只能在总统的小办公室里举行。我率领6个外交官,再加上对方总统府、外交部的官员,把小办公室挤得满满的,谢尔总统只能站在靠窗的墙角里,幸而谢尔总统的前任海涅曼总统一直主张礼仪从简,早已取消了在呈递国书时大使致颂词、总统致答词的仪式。谢尔总统在接受了我递交的国书后带着微笑说,房子正在整修,非常抱歉只能一切从简了。

谢尔是在4个月前即5月15日当选总统的。他原来在社民党、自民党的联合政府中担任外长,我第一次拜访他是在

000566L

1972年8月初。当时,中国与联邦德国还没有建交,驻在波恩只有新华分社,我从1969年底在波恩担任新华社常驻记者。我受我国政府的委托,同他商讨两国政府派代表举行建交谈判,并且邀请他在谈判结束后到北京正式签署建交公报。他表示同意立即举行谈判,并且接受邀请访问北京。不久,双方决定在波恩举行建交谈判,我担任了中方的谈判代表,同德方外交部政治司长史塔登进行了40天的谈判,在9月30日达成协议,草签了建交公报。我很快回到北京,参加接待谢尔访问的工作。谢尔在10月10日到达北京,第二天同姬鹏飞外长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建交公报。1972年底,两国都在对方的首都开设了使馆,派出了资深大使,中方是王雨田大使,德方是保尔斯大使。我也离开工作了24年的新华社调到外交部工作,在我国驻联邦德国使馆担任参赞。以后,在外交场合常常遇见谢尔外长,还在群众集会上看到他唱民歌。他有一副好嗓子,时常应群众的热烈要求唱民歌,即使后来当了总统仍然是这样。

新任的王雨田大使曾担任过外交部礼宾司长和好几个国家的大使,外交工作经验很丰富。而且他曾担任过我国驻民主德国使馆参赞多年,对德国问题也很熟悉。他是一个医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曾担任过师、纵队、军区的卫生部长,解放后被选拔做外交工作。他工作细致,原则性强,为人正直,不徇私情。但是,他到任后由于心脏病严重,难以正常工作,一年多后在1974年6月不得不调回国内休养,非常可惜,3年多后就不幸去世了。外交部原来考虑,我缺少外交工作经验,拟要我在使馆工作一段时期后再回国到部里工作一段时期,以熟悉外交业务,然后再派往国外担任大使。在王雨田大

使患病回国以后，只能改变原来的计划，提名由我接任大使。在一个国家里从参赞直接升任大使，在国际上是不多见的，在我国也是第二个。

在谈话中，谢尔总统对我出任大使表示欢迎。他说我在波恩担任记者期间对促进两国关系的建立作了很大努力，希望我继续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贡献。他回忆了对北京的访问，特别是能同周总理就国际局势和两国关系进行长时间的会谈。他说这次访问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只是时间太短，他必须回国参加11月中的联邦议会选举。他本来还想继续和我谈下去，但感到房间太小，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主要宾主围着一张小圆桌子坐着，双方其他的官员都站立一边，他只好带着歉意说，地方实在太小，这次谈话只能缩短了，好在我们都已熟悉，以后见面的机会还很多。

谢尔1919年生于鲁尔区的索林根，他1974年担任总统时只有55岁，是历届总统中最年轻的。他在1968年1月当选为自民党的主席，使自民党的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战后以来，自民党一直与联盟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联合政府。谢尔反对联盟党长期来对苏联东欧的僵硬政策和对社会改革的顽固态度，因而主张与社民党联合。自民党是一个小党，但在联盟党和社民党两个大党都不能取得绝对多数的情况下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1969年9月联邦议会选举以后，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了联合政府，谢尔担任了外交部长。他在1974年5月15日当选联邦总统后，原来担任内政部长的根舍5月17日接替了他的外长职务，并在10月1日又继任了自民党的主席。他在担任总统期间，再一次正式访问了中国，受到了我国政府的热情接待。谢尔性格开朗，处事灵

活,善于应付困难问题,而且口才好,在欧共体的外长中颇受尊敬。他在1979年五年总统任期届满之后,仍担任不少荣誉职务,常常在群众集会上看到他。

我呈递国书后,首先拜访了新任外交部长根舍。根舍也是我在担任记者时早就熟悉的,曾多次拜访过他。那时,他担任内政部长,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做了很多的工作。内政部兼管体育,他要办公厅主任金克尔告诉我,拟邀请中国两个体育记者访问联邦德国两周,一切费用由他们负担。这是联邦政府愿意同我国增强往来的第一个讯号,受到国内有关部门的重视。后来,他又会见了我为我同谢尔外长商谈建交谈判问题做了安排。在建交后,他同我谈到他邀请中国两个体育记者一事时笑着对我说,他从中美“乒乓外交”得到了启发,觉得由他出面开展两国体育往来比较合适。这事他同谢尔外长商量并得到同意后,就由金克尔告诉了我。我也笑着说,你的这个用意,我们有关部门也早已领会到了。建交后不久,根舍以体育部长的名义,应我体委主任王猛邀请访问了中国,金克尔也陪同前来。根舍生于1933年,当时才41岁,但头发已秃,脸上皱纹很多,显得颇为老成。根舍的性格正好同谢尔相反,比较沉着,不拘言笑,而且讲话简短,也很稳当,使人感到像德国人说的“有点儿干”。他过去做党务工作,社民党、自民党政府成立后担任内政部长,没有做过外事工作。因此,他担任外长之初,国内外不少人议论纷纷,怀疑他能否干得长。可是,他一共干了18年,比联邦德国和欧洲的任何一个外交部长都长,到1992年才由他原来的办公厅主任、当时已担任司法部长的金克尔所接替。

根舍担任外交部长这么长,当然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他讲究实际,注意效率,常常要求部下不论讲话和写报告,都要

观点明确,而且简明扼要。他在同我的谈话中也是一样,对我出任大使表示高兴,由于他工作实在很忙,难以到使馆参加招待会、宴会和其他活动,希望我不要见怪,但有重要的事,仍可直接找他。他在担任外长期间,曾三次访问中国。有一次他访问了四川、贵州的农村地区以后,对同行的德国人说:“我看到了真正的中国。”他回国后在写给自民党内的一个报告中说,中国各省之间和城乡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国力还并不强大。可是,根舍自己也不能摆脱别的政治家所遭到的境遇,党内对他的不满情绪增加,批评也越来越多。他在1984年不得不辞去自民党主席的职务,由经济部长班格曼接替,但仍继续担任外长的职务。

在我担任大使之前4个多月,施密特刚刚接替勃兰特担任联邦总理。勃兰特在1974年5月6日由于他的亲近助手纪尧姆被发现是民主德国长期潜伏的间谍而引咎辞职。几天后,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政府立即进行了改组,原来的财政部长、社民党政治家施密特继任总理。他担任总理后通知各国驻波恩使馆,他由于公务繁忙,不接见新任和离任的大使,也不到使馆参加招待会和宴会。因此,我呈递国书后没有去拜访他。施密特最早在勃兰特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1972年,世界上发生石油危机,联邦德国经济困难加深,财政赤字增加,失业上升,造成群众的不满情绪。经济和财政部长席勒在7月份内受到不断谴责不得不提出辞呈。勃兰特总理把经济和财政两部分开,由施密特继任财政部长。施密特熟悉财政金融问题,而且思想敏捷,讲求实际,有决断力,说干就干,后来对国内经济的稳定起了很大作用。他担任财长后不久,我作为使馆临时代办曾去拜访过他,对他的性格和作风印象非常深刻。他请我

在办公桌一边坐下之后,没有说一句外交场合初见时常有的客套话,就问我想谈什么问题。我表示想请他谈谈联邦德国和西欧的经济形势。施密特说,他当财政部长才几个月,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和处理还刚刚开始,现在来说还嫌过早。可是,他一谈起来我就感到他对经济问题很熟悉,见解也很明确,而且讲话简明扼要,没有套话,谈话半小时就告结束。后来他担任总理后,我陪同他访华时,对他的这个印象更为深刻。可是,他的观点与老一代的社民党人勃兰特不同,比较保守,因而在担任总理之后几年里,与党内的左翼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和矛盾,不仅使他的地位受到削弱,而且也引起联合政府内自民党的不安。自民党对社民党左翼一直怀有戒心,终于在1982年实行倒戈,转而与联盟党联合。担任了8年总理的施密特于1982年10月1日在议会中被不信任案击败而下了台,由联盟党主席科尔担任总理。

我在波恩从一个记者经过近3年的时间成为外交官,又经过一年多时间成为大使,因此在联邦德国政界、外交界和舆论界中成了新闻人物,因而也为我以后的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在1969年底到波恩工作,到1976年底奉调回国,在波恩一共工作了7年。在这期间,我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参加了两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也结交了许多德国朋友和其他国家的朋友,看到了联邦德国和欧洲局势的风云变化。到现在,前后担任驻联邦德国的6位大使中,已有王雨田、张彤、安致远三位大使逝世。我也已年近古稀,回顾我生命中最有意义和最可珍贵的一段,好像都历历在目,难以忘记。

到波恩工作

1969年10月底，新华社军管小组的负责同志正式通知我到波恩分社工作，而且要在年底之前赶到。这个决定使我大大感到意外和吃惊，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德国问题，连德文也完全不懂。当时，新华社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正在逐步恢复由于“文革”而陷于瘫痪的国外分社。我也已得到消息将要派我到国外去工作，但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去联邦德国。军管小组同志向我解释，现驻波恩记者项前同志最近被发现患癌症，要马上回国治疗。波恩只有新华社一家，没有其他的机构，不能没有记者在那里。而且，我出国手续已全部办好，要找其他的记者已来不及办手续。因此，要我尽快先去顶一个缺，等以后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再去接替我。我深知办理出国手续的困难，当时“文革”正在进行，极“左”思潮泛滥，原来的干部处已经“打倒”，成立了一个人数很少的工作小组，不仅要对记者的历史、经历、思想、言行进行审查，而且还要对他们上下左右三代的关系全部搞清，所以少则半年，多则1年多，才能把出国审查办好。就是像我这样经过大半年的审查，证明一切都已清楚之后，在国际部领导小组讨论我到波恩工作的会议上，还有一个负责同志提出，像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先上山下乡3年，再到国外工作。还有一个老编辑写信给军管小组，说这样的“三反分子”不应出国。可见当时流毒之深，工作之难。

我在1969年即“文革”的第3年就能出国工作，而且是老记者中的第一个，完全是靠周总理有关恢复国外新华分社的指示。我在“文革”开始就成为“三反分子”，在社内的劳改队劳

动了两年，后来恢复了发稿助理的职务。当时，我已万念俱灰，根本没有想到还会出国工作。我在1948年9月到新华社驻华东野战军总分社工作，从事军事报道。解放后，1951年10月到朝鲜开城前线，参加停战谈判的报道。回国后我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了两年，1955年又出国工作，连续担任驻巴基斯坦、加纳、几内亚、马里、扎伊尔、古巴的记者。1964年回到北京，原来准备去墨西哥、乌拉圭或其他拉美国家，但都没有得到签证，后来在国际部担任发稿助理。1966年初原来要去英国工作，但“文革”一开始就成了“三反分子”，当然也去不成了。中共“九大”以后，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问到新华社驻墨西哥的记者，参加会议的新华社同志说，早已回国参加“文革”。周总理非常气愤，责问为什么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当时，绝大多数新华社驻国外记者都已回国，有些分社空无一人，有些只有个别翻译、报务员或工勤人员在看家。周总理责成新华社军管小组立即派出记者恢复分社的工作，而且在派出的记者中要老中青三结合。

我深知我终于被派到国外工作，不仅对我本身有重大意义，而且为更多的老记者出国工作创造了条件。因此，我立即接受了到波恩的任务，也不管在今后的工作中会有多大的困难。于是，我进了第三期出国人员学习班。学习班已办过两期，一部分是出身好、成份好的年轻记者，另一部分是工勤人员，没有老、中记者。我那时45岁，当记者的时间已较长，因此算我是老记者，在三期学习班中是唯一的一个。我家庭成份不好，受过资产阶级教育，参加革命后“改造不力”，“修正主义的流毒很深”。因此，我能出国工作，其他大多数老、中记者同我一比，就比较容易通过了。那时，学习班时间很长，要4个星

期,白天学,晚上也要学到9点。所以,在业务上已没有多少时间来做准备,而且许多的书籍特别是外文版书籍在“文革”中都已封存或者销毁。我只是抢一些时间看了一些有关德国问题的简单介绍材料,就出发到波恩去。我赶到波恩时,已是1969年最后一天的中午。

小城波恩

我像所有初次到波恩的人一样,非常惊奇地看到,这个已成为世界经济中重要力量的联邦德国的首都波恩,却是一个仍保持着原来的安静、朴实风貌的小城。城市人口包括郊区在内只有30多万,这几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增加,下午5时下班时间以后街道上冷冷清清的,夜晚更没有什么行人,连车辆也不多。市内大街小巷两旁还是古老而质朴的不超过四五层高的房屋,古色古香的市政府、法院、主要的政府机构环绕在用小方石块铺砌的圆形广场的周围。广场中间竖立着本市最大的名人、音乐大师贝多芬的全身青铜雕像。这座横跨在著名的莱茵河上的小城已有两座大桥,第三座还在修建,但几个渡口的渡轮仍在来回给行人和车辆摆渡。莱茵河水缓缓地向北流去,河水已严重污染,混浊发黑,甚至飘浮着绿色的油污。政府已通过多年的要减轻污染的计划,看来并不容易实现。只有对岸七岭山上的松林显得十分苍翠,招引着许多的游客。其中的龙岩山上,古老的用铁索牵引的带着齿轮的爬山小铁车把千百游客送上山顶去,欣赏莱茵河谷的大好风光。

世界上发达国家的首都,都是繁华而喧嚣的大城市,几乎没有像联邦德国的首都那样,是一座清静而安谧的小城。这要

归功于联邦德国的第一任总理阿登纳。在1949年成立联邦政府之时,各界对首都建在什么地方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有的主张在金融中心的法兰克福,也有人认为应建在海港城市汉堡,而在波恩郊外莱茵河畔一个小村子里出生的阿登纳力排众议,坚持要在他的家乡波恩。当时这个小城只有10多万人,居民大多数从事农业劳动,特别是水果、蔬菜和葡萄酒。开始时不免人人议论纷纷,对阿登纳有不少非议。一些外地来的官员和使团的外交人员也抱怨他把首都弄到了这么一个小乡村里来,社交生活几乎什么也没有。阿登纳也承认对家乡可能有些偏爱,但坚决否认有什么私心。以后,阿登纳和他的继任者仍努力保持这个小城的特点。现在,人们都感谢阿登纳做了一件好事,住在山城里非常舒适,不像法兰克福和汉堡那样嘈杂而且空气混浊。波恩虽小,但在历史上是一座名城。建城已有2000年之久,从13到18世纪是科隆选帝侯的首府。在18世纪中,以选帝侯的宫殿为基础建立了著名的波恩大学。著名的诗人海涅和革命导师马克思在19世纪初先后在这个大学里读过法律。音乐大师贝多芬在1770年12月16日诞生在这里,并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在波恩老城的公墓里埋葬了著名的音乐家舒曼,戏剧家席勒以及贝多芬的母亲等,吸引着许多前来凭吊的游客。贝多芬故居在波恩市中心莱茵大桥脚下一条小巷的深处,是一座很简朴的小楼房。这座楼房像波恩许多老式住宅一样,从大门走进去,有一个小小的庭院,两边的花坛里绽开着各种颜色的小花,一个角上竖立着一台手压式抽水机。房屋的墙壁呈深黄色的,攀缘着绿色的藤蔓,同白色的窗棂形成鲜明的对照。当时,贝多芬的父母住在顶楼的两个小房间里,而那更小的只有七八平方米的一间,就是贝多芬诞生的

地方。现在，整个房屋已辟为纪念馆，每年前来参观的游客有好几万人。贝多芬诞生的时候，波恩的居民只有几千人，大街上才刚刚安装了第一盏煤气路灯，居民的住房也才开始编了门牌号。莱茵河上还没有大桥，两岸是一片沙滩，纤夫们在河滩的小路上艰难地、一步步背拉着纤绳前进。贝多芬的父亲是当地乐队的一名乐师，为人们婚丧喜庆吹奏，像我们中国旧社会的吹鼓手，社会地位低，收入很菲薄。但贝多芬从小在家庭里受到了音乐的熏陶，并且在弹奏钢琴上显示了出众的才能。他17岁时终于到了音乐名城维也纳，拜见了音乐大师莫扎特。这位大师听了他的弹奏后，激动地对别人说：“此人将来必定震动世界。”可是不久，他由于母亲病重又回到了波恩，等到他5年后再到维也纳时，莫扎特已经英年早逝了。他又拜另一个音乐大师海顿为师，从此他就一直留在那里学习、创作、成名，直到1827年3月26日逝世，终年只有57岁。

在市中心的波恩大学，至今仍是波恩人引以为光荣和骄傲的胜地。大学的主楼仍是当年科隆选帝侯的宫殿。这是一座长方形的房子，主楼为二层，展开的两翼只有一层，浅黄色的墙壁，白色的落地长窗，掩映在古老树木和大片草地之间，令人感到庄严和肃静。过去进城的车辆和行人都要穿过这所古老建筑围墙的侧门，现在马路已移到围墙之外，免得院内受到日益增多的车辆的干扰。在海涅和马克思来到大学读书的时候，波恩居民已增加到1.1万多人，而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就有1000多人，占全城百分之十。1819年初，海涅奉父母之命在汉堡经商失败后来到波恩大学读法律系。他在莱茵河上漫游，写了不少莱茵河谷风光的诗篇。不久，他又转学到哥廷根大学，最后完成了博士考试。马克思于1835年10月离开